

文章编号:1674-0386(2009)03-0043-05

试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民间意识

徐红妍

(洛阳理工学院 中文系,河南 洛阳 471000)

摘 要: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洋溢着湘西人健全美好的人性与强大旺盛的原始生命力,以及湘西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与崇尚自由的精神,从而使他的湘西世界呈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沈从文站在了民间的文化价值立场上来关注民间、表现民间,体现出了一名现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民间意识与民间情怀。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小说;民间意识

中图分类号:G778 **文献标识码:**A

Comments on Folk Consciousness in Shen Cong-wen's Western Hunan Novel

XU Hong-y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uo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0,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s western Hunan novel is brimming with the perfect human nature, the formidable primitive vitality, the free life style and the spirit of pursuing freedom of the western Hunan people, thus his western Hunan world presents a unique charm. This is because Shen Cong-wen stood on the folk cultural value standpoint, paid attention to the folk, and reflected the folk, which displayed the unique folk consciousness and folk mood of a modern intellectual.

Key words: Shen Cong-wen; western hunan novel; folk consciousness

沈从文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他创造的湘西世界不仅在中国文坛上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而且他的创作也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面貌。然而提及沈从文的创作,人们更多的是想到他笔下那“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以及他构筑的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而纵观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创作,无论是表现湘西人美好的人情人性还是山野小民的原始生命强力,归根到底,是因为沈从文在文化立场与美学趣味方面所具有的浓郁的民间意味,也正因为他对民间社会的认同与描写,他的湘西世界才成了一个健康自然的、富有民间文化风情的世外桃源。

一、民间社会的坚守与开拓

关于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性与民间意识虽然在

不少现代作家的笔下早已存在,但作为理论观念的提出却迟至20世纪90年代。“民间”理论最早由陈思和提出,其后引起了评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广泛讨论。何谓“民间”,民间的内涵及特点,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等成为争论的焦点。陈思和发表的《民间的沉浮》与《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提出“民间”的概念时,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它具备以下特点: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的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因而要对它作一个简单

收稿日期:2009-02-15

作者简介:徐红妍(1978-),女,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1]70}对此,王光东作了简要的概括:“一是作为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这一文化空间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它包括了种种复杂的成分;二是作为审美的文化空间,表现为以自由自在的原始生命活力紧紧拥抱生命本身的过程。这两者之间显然是既相联系又有所不同的。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艺术的或者是审美的,这两者之间相联系的中间环节则是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有了这种民间的价值立场,才能使知识分子从‘民间的现实社会’中发现‘民间’的美学意义。”^[2]王光东的阐释把当时关于民间的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他指出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在表现民间时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陈思和与王光东所阐释的“民间”去理解沈从文的创作,便不难发现沈从文创作的民间倾向和民间立场是明显的。他的湘西小说立足于民间世界,在广阔丰富的民间大地上,采撷繁多姿、形形色色的民间生活素材,从而使他的小说到处充溢着浓厚的民间文化色彩。另外,他的湘西世界也是符合“民间”特征的。湘西的民间社会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文化空间,它包括了种种复杂的成分,那里的下层人物或者讲义气、重感情,纯真善良、友爱无私,或者有着龌龊、粗暴、淫乱的性格,这种“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不仅具有巨大的文化包容性,更以一种永恒、沉稳、深厚的姿态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沈从文正是站在了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上发现了其中的美学意义。

在关注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民间色彩的同时也应看到,沈从文坚守民间的原因及意义。沈从文进入都市后不久便开始了文学创作,并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在反封建政治与宗教束缚上起过进步作用。1911年,现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霍布斯对自由主义有如下阐释:“自由主义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社会是能够完全建立在这种自我指导的人格力量基础上的。”^{[3]47}1917年,师从杜威的胡适将自由主义带回国内。在文学上他反对封建文学倡导文学改良,并以创作实践推动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沈从文是深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及创作的影响的。对此他曾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

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3]48}由于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使他在创作中对政治题材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宏伟叙事不感兴趣。但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狂飚的时代,“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相对宽松的状态在此时为“党性文学”与“党派文学”严肃的政治原则性所取代,新文学阵线也逐渐分化成带有政治色彩的不同派系。而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沈从文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文学操守,从民间去寻找艺术出路。他说:“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4]可以说,沈从文把文学触角伸向民间,从民间寻找创作主题和艺术灵感,既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其创作的影响,又开拓出别具一格的审美天地,成就了他湘西小说的艺术创作。他的《边城》、《柏子》、《丈夫》、《在另一个国度里》等小说既富有浓郁的民间气息,又体现出了作者的民间写作倾向与民间价值立场。

在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中,作者便以民间作为小说的叙事“核心”。小说围绕一个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极富抒情地渲染了茶峒一带自然生活环境的古朴宁静,勾勒了该地民风醇厚的人际关系状况,赞美了边城人民古朴原始的民间生存状态。小说中的撑船老人与翠翠过着相依为命的清贫生活,但他们却慷慨大方,乐善好施;那位颇有家资的掌水码头船总顺顺,其言行也极具君子风范,对所有人始终显示着一幅豪爽大度的古道热肠。老一代人身上所具有的纯朴善良的美好人性与人伦道德,在下一代人身上得到了承传。翠翠,这个在小溪边渐渐长大的美丽少女,有着和她容貌一样美丽的纯朴人性和溪水般澄澈的内心。她天真纯洁,有着简单而又执着的信仰,所以当她的心上人傩送没有给她任何诺言便驾船离去之后,她仍然在渡口上痴情地等着他的归来。正是因为受民间价值取向的支配,这些生活在穷乡僻壤、荒村杂社之间的人们才有着浓郁的“情”和“义”,才具有那种自在自律的生存状态。

《柏子》这篇小说不过是说辰河边上一个水手与妓女的肉体交易,男人粗鲁,女人大胆。但沈从文没有把它写成一个嫖妓与卖淫的故事,反而把他们的男女关系写得毫不含糊、淋漓尽致,突出了柏子与妓女刻骨铭心的爱情诉求,这使人物的整个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嫖妓或卖淫,而带有一种世俗情爱的理想因素。从柏子与妓女每月短短的相会中也让人窥视到了这些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

《丈夫》中的妻子为了生计,跑到城里卖淫养家糊口,丈夫在家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做丈夫的跑到城里看妻子时为亲眼所见而深感屈辱,经过一夜的灵魂搏斗,主人公的人格尊严被唤醒,第二天便和妻子一起回到了乡下,让妻子跳出了皮肉生涯的泥潭。该作透过农妇去当娼妓的经历,展示了边地贫民百姓的痛苦生活,揭示了丈夫的人性尊严受到的残酷侮辱,这是一篇关心人的命运和灵魂的作品。但只要全面地理解剖析小说的内容情景,便会发现作者对妻子出来做“生意”这件事本身并无批判或鄙视的意思。在乡下人的眼中,这也是一件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不违反健康的工作。小说中流露出了作者对人性失落的隐痛,也对妻子因生活所迫卖身赚钱深表同情。在这两篇小说中,沈从文对民间社会的关注体现出的民间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他对妓女、水手等下层人物身上粗暴、淫乱的性格既不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也不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去观察,而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把他们写得富有人情味和人性美。

他的另一篇小说《在别一个国度里》也是一篇表现民间并体现作者民间倾向的作品。这篇小说采用书信体叙述了一个被逼落草的大王娶讨一个商人女儿做压寨夫人的故事。小说的副标题是“关于住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信是八封,有大王向宋伯娘(女方母亲)求亲的,有宋伯娘的回信,还有女子与其女友的通信。落草大王在信中说自己“道义存心爱国,要杀贪官污吏,赶打洋鬼子。”如今落草为寇,并非出于本意。他爱慕大妹妹,求为压寨夫人。宋伯娘委婉复信说,等他受招后再完婚。其后果然大王受了招安,送来丰厚的彩礼,大妹妹只好嫁过去了。最后一封信是大妹妹写给其女友的。说她当知道要嫁给大王的消息时,怎样害怕,“我那时想象他,一个杀人放火无事不做的大王,必是比书上所形容的那类恶人还可怕!”但当她嫁过去之后才发现“他和我所猜想的恶处远离了。……他什么事都能体贴,用极温柔驯善的颜色侍奉我。”在外人的传说里,这个山大王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作品却通过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商人女儿的亲身感受,叙说出这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山大王实是一个既懂得恨、也懂得爱,有血性也充满温情的男子汉。显然,作品反映了作者反世俗观念的倾向与民间价值立场。作者没有充当一

个道德评判者去对像妓女、土匪这样的人物作出道德与不道德、正义与非正义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而是站在了民间的立场上去关注个体的生命与精神。在沈从文眼中,“那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爱处。”^[5]关于沈从文的民间思想与民间价值立场问题,莫言曾这样说过:“沈从文的创作,……保持着真正的民间立场和视角。他写那些江边吊脚楼的妓女,如果是知识分子立场,那就会丑化得厉害。但沈从文却把他们写得有许多可爱之处。”^[6]

沈从文站在民间的价值立场上表现出了民间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并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他笔下的人物,从而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民间意味。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气候下,沈从文能够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文学立场,坚持深入民间去寻找艺术的出路,他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成就了他湘西民间社会的独特审美价值,也成就了他的艺术创作。

二、原始生命力的寻找与被侵犯

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中将20世纪中国文化形态分为三类:一是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二是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方外来文化形态,三是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陈思和将这缩写为“庙堂”、“广场”和“民间”。^[7]郅元宝也指出“民间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无法涵盖的广阔博大的生活世界和想象的空间,是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另一种生活存在。”^{[1]70}由此可以看出,自由自在是民间社会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8]这段关于民间的论述,指出了民间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在自由的民间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原始生命力。具有强烈民间意识的沈从文,在展示湘西社会自由自在、原始古朴的民间生活的同时,也描述了民间社会所具有的强大旺盛的原始生命力。

所谓原始生命力,美国著名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做的解释是“原始生命力是一切生命肯定自身、确证自身、持存自身和发展

自身的内在动力。^{[1]172}原始生命力是一种更为深邃的生命动力,是一种狂暴的自然力,一种强大的原型功能。沈从文所创造的湘西世界便是一个强大的原始生命力世界,在那里,男人匪气十足,野性蓬勃,有血性;女人则大胆泼辣,不虚伪、不矫饰,活得坦荡自然,很少受理性、道德的束缚。在这些人身存在着一种原始的蛮性力量和崇尚自由的精神,洋溢着强大的原始生命力,他们是未被文明所驯化的野蛮族群。

在小说《说故事人的故事》中,叙述了一位军人与狱中女土匪从私下苟合到谋划越狱直至失败被杀的经过。作品在抨击边地兵匪一家的黑暗现实之外又满怀同情甚至钦佩地描写了这对男女试图主宰自身命运的决心和勇气,借此作者对他们身上的生命强力做出了深刻的揭示。虽然他们非理性的本能活动导致了不幸的结局,但当私情暴露后男主人公从刺刀下泰然步出牢门的无畏神态却让人看到:强大的原始生命力量绝难抑制,即使慑之以死亡。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虎雏》讲的也是湘西人身上所存在的旺盛生命强力以及这种生命强力的难以驯服和驯化。虎雏是一个聪颖体面的小副兵,当六弟带他来上海时,“我”决定给他一种不同的机会,让他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深知这个在野蛮地方长大的野蛮人是难以改变的六弟,便劝“我”不要自找麻烦,而“我”却自信环境可以改变任何人性,坚持要把他留下来。之后,“我”便开始按自己的要求和理想培养他,让他读书写字,让他接受城里人的生活方式,虎雏似乎也逐渐地习惯了这些。正当“我”为自己的计划有了成绩而暗自高兴时,虎雏却与另一个小副兵三多弄出了一起人命案。三多被人打死,而虎雏最终潜逃,“我”的计划也宣告失败。虎雏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他骨子里早已掺满了祖先遗传的强悍禀性。其内心不仅积蓄了无穷的力量,更包藏了一个桀骜不驯的灵魂。“我”企图让他在温室里生活,而有着旺盛生命力并向往自由的虎雏却因极不习惯于陌生环境的精神压迫而杀人潜逃。因为“当原始生命力遭到压抑时,往往以某种形式迸发出来。”^{[9]125}虎雏最后以杀人潜逃的事实说明了湘西人身上的野性与生命强力是难以压抑的,更是难以驯化的。

沈从文在不断地描写和赞美湘西人身上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和雄强精神,赞扬了这些人野蛮中透出的生命力、顽强中包含的元气、粗犷中表

露的率真、豪放中洋溢的侠情,展示着民间社会所特有的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与丰富博大的民间文化精神空间。但是,民间又是一种与庙堂相对的文化形态,而代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庙堂文化总是企图用统治思想来统一文化与舆论,这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民间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的侵犯。因此,沈从文在描述富有生命活力的民间社会的同时,也看到了民间与庙堂的对抗以及庙堂对民间的侵犯。他的《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长河》等作品就反映了民间社会与政治权力的冲突。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北溪人在地方官府来之前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一个自由原始的民间社会,尤其是在迎春节的时候,几乎人人都要喝得烂醉。但地方官府设在北溪后,要全面禁止这些事情,这让原本自由自在的北溪人失去了很多自由。北溪人极力抗拒阻止地方官的进入以保护他们的自由,但地方官府还是来到了北溪。其中有七个猎人在抗拒失败后进山当了野人,每天打猎,饮酒,继续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但是好景不常,在第二年迎春节到后,几百人去山中找这七个野人狂欢狂饮,以找回他们失去的自由,但到第三天时官府派了七十个持枪带刀的军人把七个野人杀死了,尸体留在洞中,头颅带回去示众,罪状是图谋倾覆政府,有造反心。凡是进山吃酒的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地方政府作为代表政治意识形态的庙堂文化对北溪的强行入侵,给北溪人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灾难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本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形态,破坏了民间社会原有的风貌。政治意识形态在突入民间、侵犯民间后,使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和放任无羁的民间生命形式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侵入而发生了改变,这种现象在沈从文的《长河》中同样有所描述。国民党在湘西地区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打破了湘西民间社会平静自由的生活,给纯朴善良的边民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荷,从而也使湘西的健全人性处于崩溃的边缘。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强大的势力长驱直入地侵入民间、洗劫民间,这不仅使民间社会原本纯朴美好的风俗遭到了毁灭,也改变了民间社会中原有的生命活力和既定的文化形态。

沈从文对民间的生命强力进行了张扬并从纷繁驳杂的民间社会中发现了其中的美学意义,但对于政治势力对民间的侵犯以及因此给民间造成

(下转第 51 页)

- [3]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4]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 [5]陈C.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 [6]陈C,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7]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8]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 [9]陈C.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44-50.
- [10]陈跃红.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与体制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3(2):10-22.
- [11]干永昌.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12]刘象愚.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56-64.
- [13]谢天振.重申文学性——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2000(1):1-16.
- [14]曹卫军.文学性: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J].世界文学评论,2007,(1):198-199.
- [15]胡亚敏.比较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6]刘象愚.和孟华谈比较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1996(3):107-118.
- [17]严锋.在固守和超越之外[J].中国比较文学,2003(2):23-27.
- [18]苏晖.比较文学研究:道路与方法——谭国根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研究,2006(4):10-19.
- [19]乐黛云,陈C.中外比较文学名著选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 [20]乐黛云.跨文化、跨学科文学研究的当前意义[J].社会科学,2004(8):99-106.
- [21]汪介之,唐建清.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22]刘象愚.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J].中国比较文学,2006(2):21-24.

(上接第46页)

的苦难,沈从文同样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当政治意识形态突入民间后,破坏了民间社会原始稳定、自在自足的生活形态,毁灭了充满血性与叛逆精神的民间生命。沈从文站在民间的价值立场上,看到了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和放任无羁的民间生命形式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侵入而发生了改变。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沈从文也旨在揭示在非政治意识形态的情景下人性的自然、自由的生存状态,因为只有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下,才能有民间社会的人性的美好内涵与人类的原始生命强力,才能使人类在生存发展中回到自然、自由的原始状态。

三、结语

参考文献:

- [1]陈思和.民间的沉浮[J].上海文学,1994(1):70-72.
- [2]王光东.民间与启蒙[J].当代作家评论,2000(5):101.
- [3]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M].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347-348.
- [4]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105.
- [5]沈从文.记丁玲续集[A]//沈从文别集·记丁玲[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2:268.
- [6]苏雪林.沈从文论[A]//苏雪林文集第3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301.
- [7]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J].当代作家评论,2002(1):8.
- [8]郜元宝.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民间和大地[C]//陈思和.90年代批评文选[M].上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171.
- [9]罗洛·梅.爱与意志[M].冯川,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125-126.